

Winter 2015



#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December No.31

2015年12月 第三十一期





##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第 31 期  
2015 年 12 月

主编：郭棲庆 赵宗锋

编辑：王惠英

设计：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86-10-88813845

传真：86-10-88816556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综合教学楼 1041 室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100089

### 出版人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彭 龙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 编委会顾问

林建华 北京大学校长

邱 勇 清华大学校长

李 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刘 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许宁生 复旦大学校长

龚 克 南开大学校长

彭 龙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黄泰岩 辽宁大学校长

朴永浩 延边大学校长

吴朝晖 浙江大学校长

Phung Xuan Nha 越南国立大学校长

Pirom Kamol-Ratanaku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

Khlot Thyda 柬埔寨皇家学院院长

Soukkongseng Saignaleuth 老挝国立大学校长

Artbazar Galtbayar 蒙古国立大学校长

Tin Tun 缅甸仰光大学校长

### 编辑委员会

吴志攀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

李 越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周云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伊志宏 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光耀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杨 龙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丁俊杰 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陆杰荣 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朴灿奎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罗卫东 浙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Bouadam Sengklamkhoutlavong 老挝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Kyaw Naing 缅甸仰光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rapin Manomaiviboo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Javzan Batkhuu 蒙古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Sum Chhum Bun 柬埔寨皇家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Nguyen Thi Anh Thu 越南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郭棲庆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兼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

赵宗锋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执行副主任

# CONTENTS

## 目录



### P.02

→ 2015 年 11 月 6 日上午，第十二届北京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开幕。



### P.09

→ 由辽宁大学、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承办的“2015 东北亚论坛”于 2015 年 10 月 13 日在辽宁大学召开。

## 特稿

- 02 “北京论坛（2015）”召开
- 09 “2015 东北亚论坛”召开
- 10 首届“南京论坛”召开
- 12 第三轮“中美韩三边对话”举行
- 13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举行 2015 年度理事会会议

## 学术活动

- 15 “中日韩语言文化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 16 “全球史视野下的鸦片战争暨《鸦片战争》学术研讨会”举行
- 17 “全球视野中的亚洲文化”系列学术讲座第三至第六讲举行

## 研究进展

- 19 从美国主流媒体关于“北京胡同”的报道看北京形象的国际认知
- 25 英国图书馆所编汉籍目录初探

## 研究机构

- 36 荷兰国际亚洲研究所



## 北京论坛（2015）召开

2015年11月6日上午，第十二届北京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开幕。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与联合国成立70周年，本届北京论坛主题设置为“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不同的道路和共同的责任”，旨在推动亚

太地区乃至全球学术发展，并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与文明的繁荣进步作出贡献。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伊克巴勒·里扎（S.Iqbal Riza），韩国SK集团全球董事长崔泰源，





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联合国—阿盟叙利亚危机前联合特使拉赫达尔·卜拉希米（Lakhdar Brahimi），“文明对话”世界公众论坛创始主席弗拉基米尔·亚库宁（Vladimir Yakunin），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理事长、高丽大学校长廉载浩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主持。

朱善璐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是大家的一致追求，这不会因道路选择与文化差异有所分歧。当前人类社会的文化、文明与价值观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回答和应对这三者的冲突与发展中寻求

新的和谐，是全世界共同思考的问题。北京论坛是一个具有广泛国际影响、以文明与文化为主题的学术论坛，自2004年创办以来得到中国政府与国际学界的大力支持与高度关注，在“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的论坛主题下，保持特色并与时俱进，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学术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在致辞中对北京论坛在教育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了肯定。他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推动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与沟通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此，教育无疑能够发挥文明传承与创新、沟通与互



杜占元



伊克巴勒·里扎



崔泰源



朱善璐



林建华



拉赫达尔·卜拉希米



弗拉基米尔·亚库宁



朴仁国

鉴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教育部愿意与世界一道,以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融合、促进国际交流与文化互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为实现文明和谐与共同繁荣而携手努力。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来视频致辞,肯定了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中所作的努力。他表示:“联合国旨在让所有人过上更加体面舒适的生活,消除贫困和缔造和平秩序,‘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帮助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脱贫,也成功激励了世界其他国家,而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将‘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对于即将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国际气候变化大会,潘基文希望中国能进一步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在消除贫困、维护人权、保护环境的同时,创造条件构建一个更加和谐、稳定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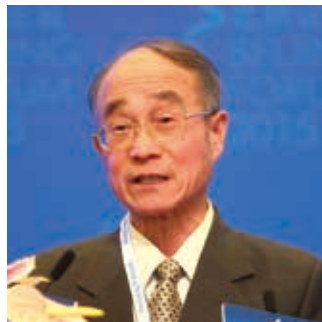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伊克巴勒·里扎宣读了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约瑟夫·里德的贺信。里德在贺信中表示,当今世界,极端主义和暴力行为依然存在,这需要我们承担共同的责任来创造更加和谐的世界,而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主题的北京论坛则为此提供了有效的对话平台。里德进一步指出,联合国维和人员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努力和平解



柯伟林



斯蒂芬·邓



钱乘旦



罗马诺·普罗迪



叶茂林



吴志攀

决冲突、争端，“联合国在避免和预防下一次世界大战上是成功的，没有联合国，世界会更加危险”。他还强调了联合国在结束种族隔离、建立国际法、保障人权等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

韩国 SK 集团全球董事长崔泰源在致辞中表示，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粮食安全、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都亟待解决。面对这些重大全球性议题，我们需要发挥集体智慧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在这方面，不仅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项目将对亚洲乃至全球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北京论坛更是提供了一个文明对话与合作交流的有效平台。

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代表北京大学对与会嘉宾和学者的光临表示欢迎。他指出，北京论

坛坚持站在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制高点上讨论地区和文明间的和谐与冲突，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和回应。近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面临考验，其中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北京论坛致力于思考中国和世界的重要问题和未来走向，为中国以及整个世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林建华向长期关心北京论坛建设和发展、给予北京论坛支持和关注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北京论坛在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上再创辉煌。

特邀报告环节，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联合国—阿盟叙利亚危机前联合特使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发表了题为“阿拉伯之春——现实还是幻想”的演讲。他提到，中东的战略位置十分





重要，人类的和谐相处离不开中东的稳定。我们应该坚持多边主义的策略，摒弃冷战思维，相互借鉴，和谐共存。世界文明多种多样，文明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交流、互鉴、融合、合作才是正确的道路。

主旨演讲环节由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主持。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哈佛中国基金主席柯伟林（William C. Kriby），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首席经济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斯蒂芬·邓（Stefan Dercon），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

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士钱乘旦分别发表了演讲。

柯伟林作了题为“中国教育是否领导世界”的主旨报告。他从中国的近代史谈起，认为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在今天，中国的教育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具备成为世界高等教育领袖的潜质。大学的伟大之处在于解放自我，大学需要空间来给予思想进行自由的提问和争辩。他期待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世界发挥更重要的影响。

斯蒂芬·邓结合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分析了全球和部分国家的经济状况，指出贫困问题



在中国和亚洲乃至世界都依然存在。他分析了世界各地的社会保障制度，并结合自己参与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援助案例，详细介绍了人道主义援助对于消除贫困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自然灾害的发生难以避免，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风险机制和全球人道主义系统的建立来缓解，充分发挥政府和非官方组织机构的作用，避免让极端事件发展为灾难。

钱乘旦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多样化与现代化的未来”的报告，认为多样性是人类文明最本质、最重要的属性。钱乘旦回顾了古代文明的多样性——两河流域、古埃及的大河文明与古希腊的海洋文明各有特色。谈到古代中国的发展，钱乘旦认为，文明具有两个载体，即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政治上的统一与孔子学说的完美对接成为中国文明两千年来生生不息的原因；物质载体与精神载体的分离使得欧洲中世纪成为黑暗的时代；而以民族共同体为物质载体、民族认同感为精神载体的现代国家使得近代西方重新崛起。钱乘旦又分析了近代西方文明崛起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冲击，但随着全球化的开展，多样性文明开始复兴。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文明优越论”不利于多样性文明的发展，多种文明只有共荣才能共存，文明多样性符合世界的发展趋势。

本届论坛为期三天，共设五个分论坛，两个专场和一个学生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新常态下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暨一带一路倡议”、“美美与共——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回顾与展望”、“大变局挑战中的社会创新”、“缔造和平之路的历史责任与多元记忆”、“艺术史的多样性”、“新型城镇化：国际经验和中国道路”、“战后国际秩序 70 年：主要国家与之关系的演变”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11月8日，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不同的道路和共同的责任”为主题的第十二届北京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落下帷幕。全球合作基金会主席、欧洲委员会前主席、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联合国—阿盟叙利亚危机前联合特使拉赫达尔·卜拉希米，联合国秘书长高级顾问伊克巴勒·里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叶茂林，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以及参加本届北京论坛的数百位学者出席了闭幕式。闭幕式由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主持。

罗马诺·普罗迪作了题为“共建新丝路”的主旨报告，围绕“如何共建新丝路，实现‘大合作’与和平增长”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普罗迪认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产生的政治环境来自于中国与周边各国政府之间长期的沟通和斡旋，他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下简称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长期政治对话和交流的结果，都凝聚着中国及其他国家付出的努力，也都能拉近欧洲和中国的关系。近年来，中欧商贸往来日趋密切，双方不仅经济依赖加强，还在其他方面开展了许多重要对话，克服了合作道路上的重重困难，取得了许多成果，彰显了团结的精神。面向未来，中欧经济合作依然存在着较大的上升空间。目前，中国众多企业正在进行技术升级，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普罗迪认为，欧洲市场选择多样、环境开放、政治性限制少，是中国企业更佳的投资对象。

普罗迪指出，建设丝绸之路需要把长期合作的想法落实成项目，这是巨大的挑战。海洋丝路建设与陆地丝路建设是丝绸之路项目中两个

重要的部分，对此，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普罗迪还提出了“数字丝绸之路”的新概念，意指应促进各国在数字信息技术领域的合作。普罗迪最后表示，欧亚地区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区域，建设新丝路是伟大的工程，有必要通过对话的形式、以团结协作的精神去推动落实。他相信，欧亚双方通过这样一种特殊形式的接触，可以创造新的未来的和平。

主旨报告后，朱善璐在致辞中对与会嘉宾和来自世界各国 400 余名专家学者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他说，今年北京论坛的举办恰逢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和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与此同时，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加强。因此，今年的主题“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不同的道路和共同的责任”，体现了论坛对单一片面发展思维的摒弃、对多元文明和谐共生理想愿景的追求。朱善璐表示，文明、和谐、繁荣、合作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参与北京论坛的学者、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企业家等，应重视文化与价值观问题，坚持高举人类文明和谐、共同繁荣的旗帜。最后，他表达了对北京论坛的美好祝愿，并欢迎与会专家、学者加强与北大的交流、合作。

朴仁国先生首先对本届北京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然后简要的回顾了三天来各个分论坛和专场讨论展现出的亮点和取得的丰硕成果。“一带一路”分论坛中，专家们肯定了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对于帮助贫困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作用以及为世界扶贫事业作出的贡献；正值世界反法西斯 70 周年之际，“和平之路”分论坛的学者们反思历史、展望未来，倡导通过达成理念共识取代依靠国家实力维持平衡的国际现状；在“社会创新”分论坛中，各国学者

深入探讨了诸多热点议题，针对许多社会问题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案；高校的学生们在“新型城镇化”专场上专心听讲，昭示着学术的继承和下一代优秀人才正在崛起……朴仁国强调，北京论坛已经发展成为多样思想孕育的温床，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他为此感到十分自豪。最后，他对北京论坛的发展提出了期望：“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们不应满足于眼前的成绩，而要继续努力，确立新的目标，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多的贡献，让北京论坛成为亚洲先锋性的平台。”

叶茂林发表致辞。他对北京论坛的成功举办作了充分肯定。北京论坛 12 年的积累，吸引了众多学者，积累了丰硕的果实，为北京市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提升了首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他指出，北京论坛为中外学者提供了交流的机会，大大促进了全球高校之间的交流，增强了相互之间的合作，并且为学术新生力量提供了发展平台。

北京论坛创办于 2004 年，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共同主办，每年举办一次，迄今已有来自世界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0 多位名流、政要和知名学者参加了这一学术盛会。北京论坛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总主题，以北京雄厚的文化底蕴为依托，致力于推动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共性问题的研究，以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全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 “2015 东北亚论坛”召开

由辽宁大学、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承办的“2015 东北亚论坛”于 2015 年 10 月 13 日在辽宁大学召开。本届论坛以“东北亚地区可持续发展：挑战与机遇”为主题，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和国内知名高校的 40 余名代表参加会议。辽宁大学党委书记周浩波出席了会议并致辞。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主持开幕式。

主题演讲由辽宁大学社科处处长胡胜主持。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洲研究中心赵全胜教授，韩国仁川大学客座教授朴胜俊，日本青年学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加藤嘉一，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副主任邢丽菊副教授，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徐文吉教授分别作了题为“智库在美国东亚转型中的作用”、“促进东北亚地区政治和解与合作的路径：韩半岛和平机制再构筑”、“日中关系如何和解”、“中

韩人文交流的历史渊源、现实基础与未来前景”、“从中朝现代化路径比较中展望中朝关系之前景”的演讲。

分会议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延边大学、黑龙江大学的 16 名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本次会议的主题作了发言。

14 日上午，“2015 东北亚论坛”闭幕。闭幕式由胡胜主持，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刘洪钟对本次大会作了回顾和精彩总结。

“东北亚论坛”是由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和辽宁大学共同主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自 2005 年起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九届，收获了丰硕的成果。时至今日，“东北亚论坛”已逐渐成为辽宁大学乃至东北地区国际学术交流项目的品牌与旗帜。

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 首届“南京论坛”召开

2015年10月19日至21日，由南京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首届“南京论坛”在南京召开。2015年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起步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本届论坛以“共创21世纪的亚太和平、安全与繁荣”为主题，邀请了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余位中外专家学者，就“一带一路”倡议、“亚太海洋资源与环境保护”、“战后70年与历史和解”、“管控亚太安全热点与地区安全合作进程”、“东亚海洋领土争议：历史与法律”，以及“亚太海洋安全合作”等六大议题展开对话与研讨。

10月19日，“南京论坛”开幕。开幕式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陈骏主持。

陈骏在发言中表示，南京大学在新的发展机遇期，努力以更开放的胸怀和合作共赢的理念，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同时，南京大学开展面向国家需求和坚持问题导向的原创科研，努力成为探索、解决国家与人类发展过程中面临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科学高地与思想库，成为国际学术交流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窗口。南京大学有能力也有信心将“南京论坛”办成具有中国特色、南大风格、国际影响的学术交流盛会。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在致辞中说，南京大学在113年的办学历程中，培养

出一大批高素质人才，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本届论坛上，各国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就亚太地区资源开发、环境保护、领土纷争、安保等问题进行讨论，发表见解。在当今这个多元化时代，个体差异和多元价值观越来越受重视，国家间的力量均衡也逐渐向观点均衡发展，既要相互竞争，更要寻求和平共存，谋求共同发展。

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缪瑞林在发言中表示，首届“南京论坛”的举办是南京市的一件大事，论坛汇聚了海内外各方面精英政要和专家学者，具有很高的国际影响力。古语云：“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自古以来读书人就心怀家国天下，教育界一贯以天下大事为己任。他祝愿本届论坛圆满举行，期望与会专家、来宾在论坛中碰撞思想，探索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解决人类发展和经济社会中重大问题的研究议题并取得更多突破。

主旨演讲环节由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洪银兴主持。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在发言中表示，亚太安全目前呈现多元化格局，亚太安全新格局形成有两个问题绕不开，即日本问题和中美关系。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成功的国事访问是在国际局势日趋复杂、中美矛盾突

出的背景下进行的，为中美关系逐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打下基础。他还提出实现亚太安全的路径和建议。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孔铉佑表示，亚太地区是全球稳定之锚、世界繁荣之基、文明对话平台。中国是周边地区和平稳定的“压舱石”，是周边睦邻友好的坚定践行者，是亚洲增长的重要牵引力。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之路，并致力于建设亚太命运共同体。

韩国西江大学校长柳基丰围绕当今世界，尤其是亚洲地区面临的严峻危机和可行的解决之道发表演讲。他说，面对全球和局部地区的挑战，必须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解决各方面问题，不断深化教育改革，适应科技革命带来的社会巨大变革。

当天举行会议开幕晚宴，洪银兴在开幕晚宴致辞中说，“南京论坛”的举办是南京大学的一个重要尝试，表明南大以自己的方式为国家 and 人类进步事业作贡献的能力和愿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倡导呼吁亚洲国家要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作为本次论坛的承办方，希望与会嘉宾能够在论坛上畅所欲言，深入研讨，共同缔造 21 世纪的亚太和平、安全与繁荣的新局面，为中国、亚太各国以及世界范围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众多国际嘉宾以及一批国际智库和国际研究机构的著名学者出席论坛，为当前东亚区域和平、发展和繁荣献计献策。

首届“南京论坛”是继“北京论坛”、“上海论坛”和“天津论坛”之后，中国国内著名高校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合作，打造的又一综合性、国际化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平台，也是南京大学致力于推进学校的重大政策关注和影响建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努力之一。“南京论坛”以“立足亚太、聚焦热点、推进合作”为宗旨，旨在通过国际年会形式为亚太经济的合作与发展、安全秩序的建立与完善提供决策支持。首届“南京论坛”汇集了中外政要、中外著名大学校长、国内外知名学者、商界精英，通过主旨演讲、研讨会、圆桌会议等形式就涉及亚太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重要议题发表见解，开展对话，谋求共识。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 第三轮“中美韩三边对话”举行

2015年10月9至10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联合举办的第三轮“中美韩三边对话”在北京大学举行。本次对话聚焦于在联合国成立及战后国际秩序形成70周年的背景下，现今国际秩序和中、美、韩关系的演进路径，以及这些变化对三国未来行为方式及地区安全和地区繁荣带来的影响。对话分为闭门会议和公开演讲两个部分。

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贾庆国、王缉思、张清敏、查道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袁鹏，国防大学徐辉，布鲁金斯学会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卜睿哲（Richard Bush）、托马斯·莱特（Thomas Wright）、菲利普·勒柯尔（Philippe Le Corre），龙洲经讯安德鲁·巴特森（Andrew Batson），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朴仁国（Park In-kook），高丽大学廉载镐（Yeom Jae-ho），延世大学李政勋（Lee Jung-hoon），梨花女子大学崔炳日（Choi Byung-il）等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10月9日上午和10月10日全天，在贾庆国、乔纳森·波拉克、托马斯·莱特和廉载镐的主持下，来自三方的专家学者就“战后70周年：

中、美、韩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中美韩三国关系”和“塑造未来国际秩序的其他主要因素”等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交流。

9日下午，“中美韩三边对话”公开演讲在国际关系学院秋林报告厅举行。魏建国作了主旨发言。李侃如、王缉思、乔纳森·波拉克、贾庆国和李政勋等5位学者就当今国际秩序面临的重大挑战、国际秩序的阶段划分、中美韩对国际秩序的认识、战后国际秩序的特点等问题作了主题发言并回答了现场观众有关南海问题、中美关系、朝核问题的提问。多国驻华使馆外交官、中国社会各界人士以及新闻媒体记者共350余人参与了本次活动。

“中美韩三边对话”会议由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资助。第一轮和第二轮对话分别于2014年4月3—4日和2014年12月15—16日在首尔和华盛顿举行。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举行 2015 年度理事会会议

2015年11月30日下午，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举行2015年度理事会会议。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中心理事长兼主任杨学义、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理事会理事：郭棲庆、蔡剑峰、柯静、张朝意、张晓慧、赵宗锋以及韩国高等教育财团金暻美、尹淙铉、金暻园参加了会议。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执行副主任赵宗锋主持会议。

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兼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郭棲庆向理事会作了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2015年度工作报告，与会各

位理事认真审议了中心的工作报告，对中心一年来的工作表示高度肯定并对中心的建设与发展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

今年也是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理事会的换届年，根据《北京外国语大学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关于建立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补充协议》的精神，校长彭龙教授将担任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新一届理事会的理事长。

杨学义在讲话中对朴仁国总长一行在百忙中莅临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2015年度理事会会议表示感谢，对朴总长及财团其他同仁给予他



工作的支持表达了诚挚的谢意,希望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在新一届理事长的领导下能继往开来,开拓创新,把中心的工作做得更好。

朴仁国对杨学义教授担任中心理事长6年间在繁荣亚洲文化、推动亚洲研究方面所做的努力与贡献表示感谢,希望杨学义继续关心并指导中心的工作,欢迎杨学义参加财团与中心的重要活动。朴仁国总长高度评价了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一年来的工作,还重点围绕“亚洲研究学术信息数据库”的建设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彭龙在发言中感谢杨学义教授与朴仁国总长多年来对中心工作的精心指导与大力支持,向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一行介绍了学校的学科建设,尤其是北外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举措,强调了北外现有70种外语以及未来5年内发展到100个外语语种对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彭龙表示,北外希望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能够开展多方面的合作,希望财团一如既往地

支持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的工作,中心期待与财团学术团队就如何将“亚洲研究学术信息数据库”建设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要学术信息数据库开展深入研讨与深度合作,把中心的工作越做越好。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自2007年末成立以来,资助课题研究项目、信息汇总项目共计194个,截至2015年12月,课题研究结项95个,其中72篇成果论文发表在国内外不同级别的刊物上,信息汇总结项34个,13部学术著作由中心资助出版。今年7月,中心对“亚洲研究学术信息数据库”分类数据库下原来的“重要国家”子数据库进行了扩建,并改名为“国别研究”,将原来的由5个亚洲国家构成的重要国家子数据库升级为现在的由20个亚洲国家构成的“国别研究”子数据库,新增设的国家包括:蒙古、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伊拉克、伊朗等。国别研究数据库收录了上述20个国家本国以及全球对该20个国家以“人文社科综合”学科领域为主的相关学术信息资源。目前,数据库已收集各类信息资源502556条,其中图书4327条、期刊论文432634条、学位论文39228条、会议论文26300条、科研机构32条、期刊30条,外文资源51628条,涉及中、英、日、韩4个语种。

目前,“亚洲研究学术信息数据库”已挂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特色(自建)数据库分类下,欢迎大家使用,并对数据库的建设与发展提出宝贵建议。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 “中日韩语言文化比较研究” 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2015年10月16日至17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主办、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协办的“2015中日韩语言文化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举行。北外副校长贾文键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北外日语系主任邵建国主持。来自日本文教大学、韩国日本语言文化学会、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博士生参会。

贾文键回顾了日语系的发展历程及日语系与文教大学的友好交流与合作，充分肯定了与会专家通过知识交流和合作研究，促进中日韩三国之间的文化共识所起的积极推动作用。

日本文教大学校长野岛正也、韩国日本语

言文化学会会长牟世钟、北京师范大学日语系主任王志松分别作了题为“‘老年’的文字表达和老龄社会的将来”、“日语教育作为人文学科的价值和必要性”、“幻想的世界——夏目漱石的‘超自然物论’和文学的想象力”的主题演讲。17日，与会代表围绕“日本语言”、“日本文学”、“日本社会文化”等问题在分论坛中进行了交流研讨。

此次研讨会议题广泛，讨论热烈，收获颇丰。中日韩三国专家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通过思想的碰撞和智慧的交锋，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东亚文化的共性和差异。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 “全球史视野下的鸦片战争暨《鸦片战争》学术研讨会”举行

2015年10月24日，“全球史视野下的鸦片战争暨《鸦片战争》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会议由北外全球史研究院、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与新星出版社共同举办。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党校、德国弗赖堡大学、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言。研讨会由新星出版社副主编刘丽华和北外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主持。

李雪涛和新星出版社编辑向珂分别就本次会议的缘起、意义及蓝诗玲《鸦片战争》汉译本的出版前后作了介绍。

欧洲著名史学家蓝哈特（W. Reinhard）、北外特聘教授顾彬（W. Kubin）、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院长培高德（C. Eberspächer）分别从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政策和全球毒品消费史、概念史以及德中关系史，对鸦片战争进行了讨论。国内

与会专家围绕英国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的《鸦片战争》中译本的出版进行了讨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郭卫东、军事科学院教授刘庆，《鸦片战争》中译者、中央党校教授刘悦斌，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等分别从鸦片贸易、军事、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等角度进行了讨论。此外，曾协助林则徐禁烟的邓廷桢的后人、民国史学家邓之诚的嫡孙邓雷也参加了会议，同时向与会者展示了邓廷桢的墨宝并介绍了邓之诚对鸦片战争的研究。

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外部分师生旁听了会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腾讯文化、《看天下》等多家媒体参加研讨会并进行了相关报道。

全球史研究院



## “全球视野中的亚洲文化” 系列学术讲座第三至第六讲举行

2015年9月24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共同主办的“全球视野中的亚洲文化”系列学术讲座第三讲举行。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University Duisburg-Essen）东亚所教授杜仑为北外师生作了题为“学‘儒学’对我有用吗？——浅谈‘仁’作为人的本质和任务”的讲座。

杜仑从“仁作为人的本质”和“仁作为人的任务”两个角度，围绕“仁”的含义、性善论和天命等方面，对“仁”这一儒家核心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认为儒家在现代社会仍有其现实价值与意义。在讲授知识之余，杜仑还启发人们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全球化时代，面对占据主流地位的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的冲击，中国人如何在传统文化中找寻自己的文化基因，进而对世界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随后，杜仑以“当下经典大众化等现象是否有意义”为切入点，正面回答了同学们所提出的各种相关问题，回应和深化了讲座主题。

2015年10月16日，“全球视野中的亚洲文化”系列学术讲座第四讲举行，美国犹他州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人文学院教授韩大伟（David Honey）作了题为“井底之蛙：我的《中国经学史》一套书”的学术讲座。

韩大伟从其著作《西方经学史概论》入手，向北外师生介绍其治学灵感、经验、心得和内

容。韩大伟的治学之路，从西方的 Hugh Lloyd-Johnes 的 *Blood for the Ghosts: Classical Influenc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1982) 开始，受到文艺复兴著名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莫的治学方法影响，从西方的经学研究，逐渐转到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并将二者进行比较。比如中世纪的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神学（theology）与宋元明的理学和心学之间的比较研究。

韩大伟重点介绍其最近所完成的《中国经学史》第一、二卷。《中国经学史》计划出版六卷，横跨从周朝到民国的整个中国经学史。其中，第一卷为《周卷：孔子、六经和师承问题》，第二卷为《中国经学史：秦汉魏晋卷》。韩大伟教授提纲挈领，采用西方之治学方法，突破以往先秦至魏晋以来的传统经学研究，别开一面。

韩大伟，美国著名的中国古代经典研究专家，深谙中国文化和汉语。讲座中，他谈笑风生，将多年之治学宝贵经验心得，通过大方幽默之语言，引经据典的方式，传授给在场师生，不时引起在座听众的热切反应。

韩大伟潜心中国经学，希冀以西方经学史之研究方法和原则，撰写一套（六卷）的《中国经学史》。现已完成第一卷《周卷：孔子、六经和师承问题》和第二卷《秦汉魏晋卷：经与传》。

2015年10月19日,“全球视野中的亚洲文化”系列学术讲座第五讲举行。中国传媒大学王永恩副教授为北外师生作了题为“新加坡华文戏剧”的学术讲座。

王永恩首先向大家明确了“戏剧”与“戏曲”的概念和区别,并简单介绍了新加坡的基本国情与文化遗产,重点梳理了1919年以来新加坡华文戏剧的发展脉络,细致讲解了中国戏剧对新加坡华文戏剧的重大影响。王永恩以时间为经,主要剧作家及其代表作为纬,将中国、西方、新加坡三方的戏剧特点、思潮、作品进行比较,生动详细地讲述了新加坡华文戏剧的发展历史,以及它的发展和与中国历史、中国戏剧发展之间的关系。她强调,在抗战时期,新加坡华语戏剧中出现不少以抵制汉奸为主题的作品,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新加坡华人的民族气节和热爱母国的真挚情感。同时,她指出,审视一部戏剧作品时,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立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考察它所发挥的历史角色和意义,决不能剥离作品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否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讲演结束后,现场学生就“中、新戏剧文化交流”、“新加坡华文戏剧的发展”等问题与王永恩教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王教授表示,只有不断加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海外华文戏剧才能持续发展壮大,中国文化“走出去”才能加快步伐。

王永恩,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央戏剧学院学士、硕士和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上海戏剧学院博士后。主要著作有《明末清初戏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戏海飞鸿》等。

2015年11月2日,“全球视野中的亚洲文化”系列学术讲座第六讲举行。中国传媒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周靖波为北外师生作了题为“韩国日常生活与中国文化”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梁燕教授主持。

周靖波从21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朝鲜电影切入,简要介绍其本人对朝鲜、韩国文化的认识。随后,周教授又讲述了他在90年代中期赴韩教授汉语的经历,以及在此期间的诸种见闻与感受,从韩国的历史和文字两个方面入手,探寻韩国日常生活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周教授认为,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韩国有其独特的系统和方法。

周靖波梳理了从古朝鲜到高丽,再到李氏朝鲜的韩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分析了中、韩两国的历史文化渊源。继而他从儒家思想、五行、中医、传统节日、音乐、舞蹈、戏剧等方面横向展开,特别介绍了中国古代的汉字和教育制度对韩国的影响,最后还向师生们展示了韩国当代饮食文化和餐桌礼仪。周靖波的精彩讲座,使在座的师生们切身感受到中国文化在异国的独特魅力。

讲座结束后,周靖波围绕“韩国饮食文化”、“中韩文化交流”、“中韩进出口贸易往来”等问题与学生们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与讨论。

周靖波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理事,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中国现代戏剧史、中外戏剧理论、当代文学批评等。著作主要有译作《戏剧理论与戏剧分析》、《西方戏剧史》,以及长篇小说《郭沫若》等。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 从美国主流媒体关于“北京胡同”的报道 看北京形象的国际认知<sup>1</sup>

张颖 /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名扬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是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作为北京的人文符号，胡同如今已经成为北京最具魅力的地方。

在这里不仅可以了解北京市民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和邻里关系，也可以看到历史的变迁，时代的风貌，感受浓郁的人文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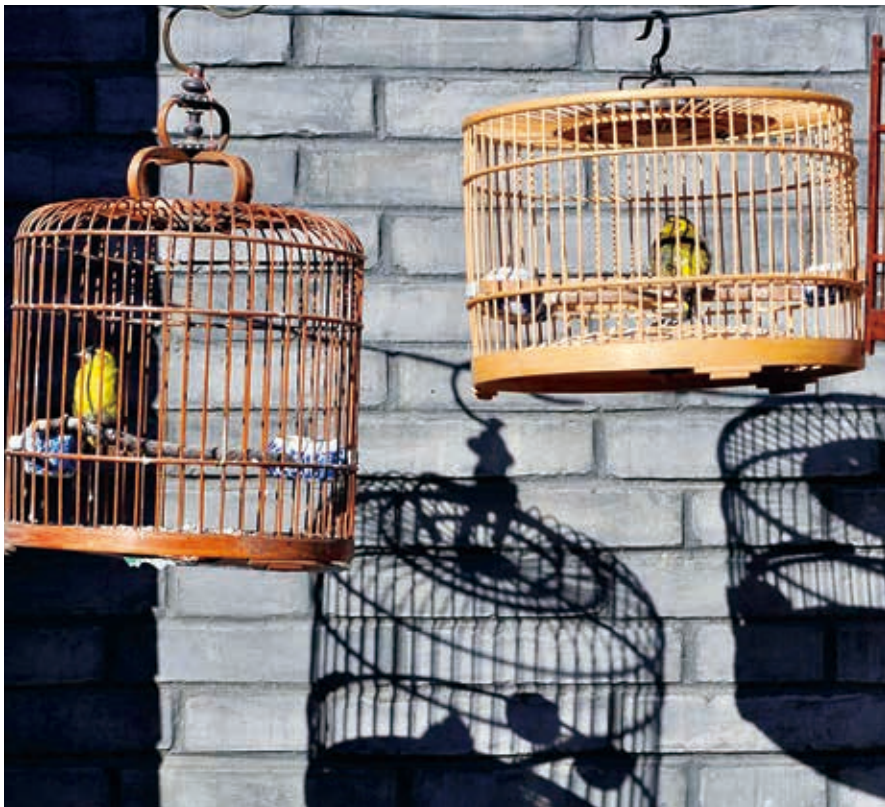
1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华盛顿邮报》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2008—2012）”的研究成果。



## 一、美国主流报纸对北京形象的建构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是美国三家主流报纸，是在美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众媒介。《纽约时报》一直享有“档案记录报”的美誉。《华盛顿邮报》是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最大、最老的报纸，在美国享有广泛的声誉和影响力。《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是美国面向全国的颇有影响的四开日报，不仅受到美国中上层知识分子的欢迎，而且还为美国国会、政府部门以及海外研究国际问题的人士所重视。随着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北京被美国主流媒体广泛报道。

笔者利用 LexisNexis-Academic 学术全文数据库<sup>1</sup>进行检索，检索范围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0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间所有报道，界定检索的关键词为“Beijing”，据此，获得研究样本。这期间，关于北京的所有新闻报道总篇数，《纽约时报》为471篇，《华盛顿邮报》398篇，《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80篇。同一时期，《纽约时报》报道伦敦的篇数为355篇，巴黎396篇，东京231篇；《华盛顿邮报》报道伦敦的篇数为362篇，巴黎370篇，东京285篇；《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报道伦敦的篇数为261篇，巴黎266篇，东京210篇。以上可以看出，美国主流媒体对北京的关注度最高。不仅如此，美国主流媒体报道的内容也最为广泛，题材选择的角度也十分丰富，涉及北京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方面面。

在检索出的涉及北京社会议题的报道中，《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约占总报道量的35%；《华盛顿邮报》41%；《基督教科学箴言报》37%。通过以上的数字可以看出，美国主流媒

体对北京的关注偏重于社会方面的议题。胡同，是外国人来北京游览的必选内容，美国三家主流报纸对此也有所报道，本文拟通过对新世纪以来（2000—2015）美国三大主流报刊对北京胡同的报道进行分析，力求从一个侧面认知北京作为世界城市在国际媒体中的形象。

## 二、美国主流报纸中的北京胡同

美国主流报纸对北京胡同的报道分为三类：

1 《LexisNexis-Academic 学术全文数据库》是美国 LEXIS-NEXIS 公司出品的面向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的信息资源数据库，收录内容涉及新闻、法律、政府出版物、商业信息及社会信息等相关领域。该库在法律法规方面的信息收藏独具特色，且即时更新，在业界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一）游人眼中的北京胡同即是真正的北京

建筑是一个城市的衣装，也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底蕴和内涵。在许多外国旅行者眼中，北京胡同就是真正的北京。正如《纽约时报》2012年5月6日刊登的《东部中国，通过三个大门》一文所称：“北京有许多古老的胡同，上海有许多茶馆，香港有很多保存了好几个世纪的庙宇。”《纽约时报》2015年2月22日刊登的《在北京你做什么？》一文称：“想真正了解北京，你不得不深入钻研北京的胡同。雍和宫周围的老北京胡同是感受北京街头生态的极好去处，尽管多年来，北京的许多胡同已经遭到破坏。”2004年11月7日《华盛顿邮报》旅行栏目中的一篇游记——《在北京骑自行车》则是这样介绍胡同的：“租了辆几乎全新的15速的山地自行车，可以在几个酒店租。到哪去骑：天安门广场和故宫周围的护城河以及一些非常好的胡同是适于骑自行车的非常好的观光地。”

后海是外国游客集中的地方。这里既有湖光潋滟，也有鳞次栉比的酒吧，更有让人流连忘返的老北京典型的胡同和四合院。2011年10月9日《华盛顿邮报》的一篇题为《北京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是这样描述的：“在后海，许多传统的胡同被保留了下来。

**北京既是古城，又是繁忙的大都市，旧城内传统街道需要被改造、拓宽。随着北京城市规划的需要，许多胡同的风貌只能留在记忆中。对此，美国主流媒体大多表示惋惜，且持批评观点。**

许多中国人抱怨太多的外国人在后海开餐馆、酒吧和商店，但是后海的居民在尽力拥抱现代的同时，也保留了一部分过去，北京仍保留了旧中国的元素。”2003年11月16日《纽约时报》发表美国艺术评论家马克·史蒂文斯的文章《拆除城墙的北京》是这样描述这里的：“你可以进行胡同游，可以乘三轮车。后海有很多酒吧，饭店和茶馆也很好。在北京老城区，你可能会迷路，因为会拐来拐去。”“中国看起来比美国古老得多，但是也年轻得多。”

近代以来，在北京向着现代化都市迈进的过程中，无论在商业经济的兴起、发展、繁荣的代表性上，还是在市民阶层和市井文化的形成上，前门地区都是一个重要的地区。这里纵横交错的胡同，不仅构成了北京城

的独特格局，而且每一条胡同的背后，诸如大栅栏、鲜鱼口、珠市口等，都记述了北京近现代的历史。对此，2009年9月13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漫游北京的大街小巷，小商小贩大叫着》的游记曾这样写到：“感受老北京的一个好地方是前门——一个贫穷的，但是有趣的地方，混杂着许多胡同和东倒西歪的房子。”该报的另一篇报道则称：“前门是最后的保存完整的胡同之一，是教师、店主、外来务工人员和其他工薪阶层的家。”<sup>1</sup>

（二）批评破坏北京胡同的做法

北京既是古城，又是繁忙的大都市，旧城内传统街道需要被改造、拓宽。随着北京城市规划的需要，许多胡同的风貌只能留在记忆中。对此，美国主流媒体大多表示惋惜，且持批评观点。

城市的发展与对古老建筑的保护始终是北京市政的一个难题。2003年11月16日马克·史蒂文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拆除城墙的北京》一文中发出这样的感慨：“北京将相像的和不相像的、现代的和古老的因素混杂在一起。林荫大道就坐落在古代城墙的位置。城墙的拆除给予了这个城市自由，但是也使这座城市变得更加令人迷惑，主要是风格混合。”<sup>2</sup>

2001年3月14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为什么北京呈现出满

1 吉姆·亚德利：《奥运会危及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京古建筑》，载《纽约时报》2006年7月12日。

2 马克·史蒂文斯：《拆除城墙的北京》，载《纽约时报》2003年11月16日。



皱纹的乡下脸?》一文同样反映了古建筑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冲突。文章指出:“在中国,随着财富的增加,高层建筑交易变得更加有利可图,老的胡同正在被拆迁,以便为新的大都市的构想让路。1999年,北京表现出了惊人的破坏速度,在市中心仅留出25个保护区。北京应该意识到,从长远来看,修复这些老城区看起来是更加有益的。但资料显示,对胡同的替代行动仍在继续,不再修复胡同。”

2010年7月21日的《纽约时报》刊登题为《推土机面对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邻居,反应不同》的报道则直指北京老城区被破坏的事实,文章称:“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在鼓楼北部,大量的老房子被推土机清除,来为附近在建的地铁站让路。”

《纽约时报》2013年3月24日的《在老北京出售》一文对鼓楼地区老城区改造做了报道,该文称:“2010年,当地媒体报道称,除了钟楼和鼓楼,布满了胡同和四合院的钟楼和鼓楼地区将被拆除以为新的‘北京时代文化城’”和地下购物商场让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但是在2012年末,政府张贴告示,命令当地商户和居民搬走,许多胡同将被拆除。许多居民已经离开,留下来的居民要求给予更多的补偿金。一位退休的武术家卢先生认为对胡同的破坏意味着老北京生命肌体的破坏。在过去的几周里,在鼓楼,推土机一直在积极地工作。鼓楼正在被破坏。”

**近来,胡同日益遭到破坏已经引起了历史学家和当地居民的忧虑。胡同已经被大规模的商业项目所替代。但是有迹象表明,北京市政府正在尽力阻止这种非法建设。**

2000年8月7日《华盛顿邮报》的《中国杂志:一个北京男人呆在家里》一文以一个个案对北京胡同的消失进行了分析。该文讲述了一位退休教授拒绝离开自己在胡同中的老房子,并与政府产生矛盾的故事。该文称:“82岁的退休教授赵先生的老房子单独存在,如废墟中的一个小岛。”文章援引赵先生的话说:“他的房子可以追溯到350年前的明代,他希望北京市政府把它定为文化遗产以便不被拆毁或者改造。”赵说,“由于发展,我们的历史正在被毁灭。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有责任保护北京作为古都的特征。如果你破坏了,就无法恢复了。”文章由此认为:“传统北京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长达十年的建设继续改变着北京的外形和规模。它的具有特色的狭窄的胡同和四合院(这能保护居民不受中国北方的天气,包括大风的攻击)的建筑让位于高楼大厦和拥挤的交通。”



(三) 关注政府在胡同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

虽然这方面的报道不多,但从有限的报道中,仍可以看出美国主流媒体对北京报道的细微变化。

2010年9月8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中国: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京街道、放弃重建计划》一文指出:“北京官员已经搁置了一项备受攻击的、重建鼓楼周边的计划(将一些胡同和明清两代的小房子改造成拥有高端商店的观光点)。这些胡同是仅存的、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没有被破坏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居民区。”

2013年7月30日,《纽约时报》的《13世纪的胡同和非法修复的现代瘟疫》一文在对北京胡同的消失进行评论时表示:“20世纪80年代,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在迅速地消失——使这个首都失去某些独特之处。近来,胡同日益遭到破坏已经引起了历史学家和当地居民的忧虑。胡同已经被大规模的商业项目所替代。但是有迹象表明,北京市政府正在尽力阻止这种非法建设。”

### 三、对美国主流媒体关于北京胡同报道的分析

美国主流报纸对北京胡同的报道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对北京形象的认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停留在怀旧色彩中的北京记忆

北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自鸦片战争以来,许多外国人来到中国都要落脚北京。这里留下了他们许多美好的记忆和诸多相关的文章。有些人的记忆甚至还留在清末

民国时期,北京形象自然而然地与高楼大厦相去甚远,而胡同则成为他们记忆中抹不去的印象。正因如此,21世纪后,当许多西方人重新来到北京时,不仅为北京高楼大厦之多而错愕,也会为大量胡同的消失而遗憾。这种复杂心态表现在美国三家主流报纸对北京胡同的报道上,则体现为怀旧心理和希望能看到最原始最古老建筑的旅行者视角。

(二) 对北京城市建设的正反两方面认识

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常常是背离的。一个城市的发展永远无法停留在对历史的保护上。尽管北京胡同中的一砖一瓦对于当地居民有着特殊的意义,蕴含着特殊的故事。然而随着人口膨胀、社会发展,传统的胡同、四合院已经不能跟上时代的节奏,为了发展现代化交通,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胡同必然被改造。

另一方面,每个世界知名城市都应该有自己的建筑语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趋同的现象,给人“千城一面”的印象,以致丧失了中国城市的风格和个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都北京,必须呈现出自己的风格:作为老北京的特色与象征,胡同承载着北京在历史、政治、社会、地理、人文等方面的多重内涵。应当适当保留。

从以上两个方面看,美国三家主流报纸对北京胡同的报道恰恰反映了美国媒体对北京城市建设的正反两方

面认识。一方面，相关报道提出的要求政府保护四合院、胡同等古建筑的建议是合理的，也是有建设性的，甚至是前瞻性的；另一方面，这三家媒体的许多文章并没有从北京市城市发展的角度思考问题，对一些老城区居民的生活状况缺乏深入了解，仅仅从古建筑保护的角度观察和思考问题，其结论显然有失偏颇。

### （三）胡同报道中的“冷战思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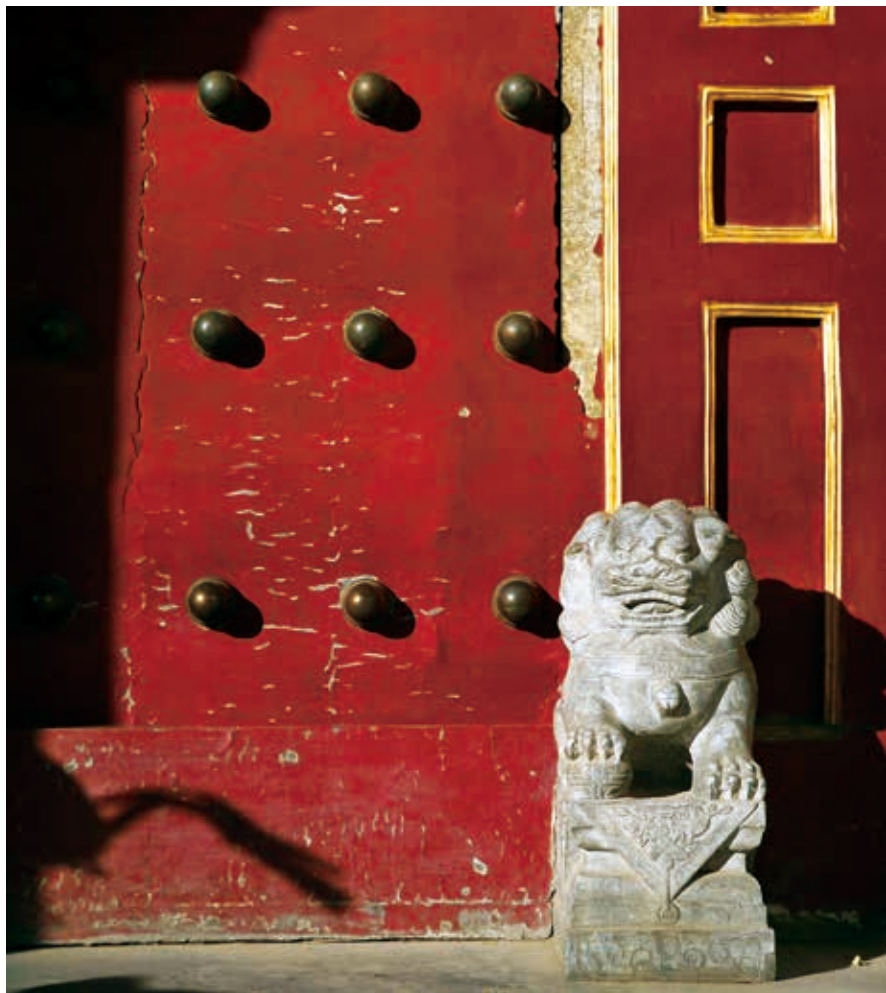
从真实性的角度看，美国主流报 .....

**胡同是古老北京的特色之一，它曾经吸引了无数外国游客，也正在为各国媒体所关注。如何有效地保护这张名片，让这张名片具有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北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纸在报道北京胡同时基本上能尊重事实，比较客观地进行报道。但从其倾向性看，其负面报道文章的数量是很大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美国主流媒体的对华认知密不可分。

首先，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严重影响了美国主流报纸对北京形象的认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主流新闻媒体依然习惯于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偏见让其对中国的报道往往先入为主。其次，我国政府和媒体及时有效应对西方媒体主观报道的能力不足也客观上助长了西方媒体对北京形象的错误建构。最后，我国长期以来的信息不够透明也容易造成美国主流媒体对北京形象的误解。以美国主流媒体集中报道鼓楼地区的老城区改造为例，事实上，这里仅仅是在建设地铁站，而非对老城区进行拆除。其结果也远没有美国主流媒体所描述的那样发生了重大变化，相反，这里的胡同一天天变得更加美丽、舒适了。正如2014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所描述的：在北京传统胡同聚居区的鼓楼地区“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找到了更亲密的接口，北京这座城的人文形象也更加立体。”

胡同是古老北京的特色之一，它曾经吸引了无数外国游客，也正在为各国媒体所关注。如何有效地保护这张名片，让这张名片具有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北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英国图书馆所编汉籍目录初探<sup>1</sup>

谢 辉 /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 摘要

从 1838 年起至今，英国各类图书馆所编纂的汉籍目录达 14 种之多。其采用的分类编排方法，包括关键词首字母法、西方学科分类法与五部分类法。这些目录揭示了英国收藏汉籍的基本情况，著录了多种善本，描绘了汉籍的流转历史，代表着英国学者编纂汉籍目录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在分类、著录、版本考察等方面，也存在着诸多不足。

### 关键词

耶稣英国 图书馆 汉籍 目录

1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英国图书馆所编汉籍目录研究”的研究成果。



英国是欧洲收藏汉籍历史较久、藏量较丰富的国家之一。自19世纪起,英国各图书馆即陆续为其收藏的汉籍编制目录。据初步统计,目前已公开出版的目录达14种之多,而敦煌文献、黑水城文书等出土文献的目录,以及已编制完成但尚未刊行的目录(如郑金生教授编《李约瑟研究所收藏中医线装书目录》等),尚未包括在内。对这些目录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汉籍流入英国的历史、英国学者对其进行编目整理的方式,以及英国现存汉籍的总体面貌,从而推进欧洲藏汉籍的研究与访归。

### 一、英国图书馆所编汉籍目录的基本情况

目前所见的14种英国图书馆所编汉籍目录,涉及八所典藏机构,即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剑桥大学图书馆(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SOAS Library)、惠康医学史研究所图书馆(Library of The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皇家亚洲文会图书馆(Library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ndia Office Library)与克劳福德图书馆(Crawford Library)。以下即以典藏机



构为纲,对这些汉籍目录的基本情况加以叙述。

#### (一) 大英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的汉籍目录共有两种,均为英国汉学家道格拉斯所编。道格拉斯(Robert Kennaway Douglas, 1838—1913),1838年8月23日出生于德文郡,1858年来华,先后在广州、北京、天津、大沽领事馆供职,1864年返英后任职于大英博物馆,并成为1892年成立的东方写本与印本部的首任主任,直至1907年退休。在大英博物馆任职期间,道格拉斯为东

方部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包括采入雍正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接收王韬捐赠的200余种典籍,以及搜求太平天国与义和团文献等。<sup>1</sup>而其主要贡献之一,即是编纂了《大英博物馆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Catalogue of Chinese Printed Books, Manuscripts and Drawings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Museum*)及《续编》(*Supplementary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and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前者编于1877年,著录了当时大英博物馆所藏的汉籍约两万卷,<sup>2</sup>由《目录》、《索

1 Yu-Ying Brown, "Sir Robert Kennaway Douglas and his contemporaries", *British Library Journal*, 24(1), P.122—129.

2 道格拉斯:《1877年版大英博物馆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页。

引》、《新入藏文献题名目录》、《写本目录》、《写本索引》、《新入藏写本目录》等部分组成。后者编于1903年，著录了1877年之后进入大英博物馆的汉籍，包括萨道义（Ernest Satow）捐赠的和刻本与朝鲜刻本，戈登指挥的“常胜军”与太平天国作战的相关文献，以及西方著作的中译本等，<sup>1</sup>由《目录》、《补遗》、《索引》三部分组成。1973年，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与国立中央图书馆等合并成立英国国家图书馆。故此两种目录所反映者，实为目前英国国家图书馆的汉籍收藏。

## （二）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博德利图书馆所编的有关汉籍目录，目前可见者达四种之多。其中较早者为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所编的《博德利图书馆中国典籍目录》（*A Catalogue of Chinese Work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该目录总共著录299部文献，于1876年出版。其后日本学者南条文雄（Nanjō Bunyū, 1849—1927）又编有《博德利图书馆新入藏中、日文刻本与写本目录》（*A Catalogue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Books and Manuscripts Lately Added to the Bodleian Library*），于1881年出版。该目录著录各类文献共计64部，其

**剑桥大学图书馆所编汉籍目录，目前共有两部，即《剑桥大学图书馆威妥玛文库汉、满文书目录》（*Catalogue of the Wad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及《续编》。**

中前三十七部为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旧藏的佛教文献，分为汉译佛教经咒、梵文、悉昙文等八类，基本均为日本刊刻；第三十八至第四十四部为阿摩司（S. Amos）旧藏的法律典籍，其中包括《唐律疏议》等5种中国法律典籍，与《类聚三代格》等两种日本法律典籍，但仅有《大清会典》与《大清律历刑案新纂集成》刻于中国，其余均为和刻本；第四十五至六十四部为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旧藏，大致亦均为梵文与佛教文献。博德利图书馆19世纪前的汉籍收藏情况，主要即从这两种目录中反映出来。

至于20世纪80年代，博德利

图书馆又编有两部汉籍目录，即编于1983年的《牛津大学中文旧籍书目》卷一《巴克豪藏书》（*A Catalogue of the Old Chinese Book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Vol. 1, The Backhouse Collection*），与编于1985年的卷二《伟烈亚力藏书》（*A Catalogue of the Old Chinese Book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Vol. 2, Alexander Wylie's Books*）。二书均为何大伟（David Helliwell）以中文编成，与一般的汉籍目录著录书名及作者用中文、其余均用西文的做法不同。前者收书551部<sup>2</sup>，后者收429部<sup>3</sup>，代表了博德利图书馆对汉籍整理编目的最新成果。

## （三）剑桥大学图书馆

剑桥大学图书馆所编汉籍目录，目前共有两部，即《剑桥大学图书馆威妥玛文库汉、满文书目录》（*Catalogue of the Wad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及《续编》。二书均由著名汉学家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编纂，前者于1989年出版，收录汉籍883部4304卷<sup>4</sup>；后者则出版于1915年，收录《全唐文》等新入藏的汉籍100余部，总卷数超过1300卷<sup>5</sup>。每书之后均有书名与人名索引，便于查找。

1 Robert Kennaway Douglas, *Supplementary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and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Longmans & co.[etc.] 1903, Preface.

2 David Helliwell, *A Catalogue of the Old Chinese Book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Vol.1, The Backhouse Collection*,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1983, iv.

3 David Helliwell, *A Catalogue of the Old Chinese Book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Vol.2, Alexander Wylie's Books*,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1985, iii.

4 Herbert Allen Giles, *Catalogue of the Wad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8, VIII.

5 Herbert Allen Giles, *Supplementary Catalogue of the Wad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5, VI.

#### （四）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以收藏马礼逊旧藏汉籍著称，早在 19 世纪前、中期，该批汉籍即编有一种手写的草目，其后又有《马礼逊中文图书馆目录》(*Catalogue of the Morrison Chinese Library*)，但似乎均未刊行。<sup>1</sup>直至 1998 年，才由魏安 (Andrew C. West) 编成《马礼逊藏书目录》(15)。该目录共收录 893 种文献，其中 92 种有副本，总计 1001 部。<sup>2</sup>书后有书名与人名索引，另有《未见书目录》，收录见于草目与《马礼逊中文图书馆目录》而今已阙失的文献 160 余部。

#### （五）惠康医学史研究所图书馆

惠康医学史研究所图书馆以其创立者亨利·惠康 (Henry Wellcome, 1853—1936) 的名字命名，以收藏医学文献著称于世。对于其所收藏的汉籍，该馆曾编有《惠康医学史研究所图书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目录》(*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and Manuscrip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于 1994 年出版，著录汉籍 210 部，并附有惠康中国出版基金于民国间资助出版的译著 18 种与该馆所收新印中文图书 300 余种的目录，以及图版十余幅。

**皇家亚洲文会成立于 1823 年，以研究与亚洲相关的科学、文学及自然产物的课题为宗旨，是国际上以亚洲研究为宗旨，历史最悠久、地位最崇高的学术机构之一。其图书馆所藏汉籍，曾先后编有两部目录。**

#### （六）皇家亚洲文会图书馆

皇家亚洲文会成立于 1823 年，以研究与亚洲相关的科学、文学及自然产物的课题为宗旨，是国际上以亚洲研究为宗旨，历史最悠久、地位最崇高的学术机构之一。其图书馆所藏汉籍，曾先后编有两部目录。早在 1838 年，即由基德 (Rev. S. Kidd) 编成《亚洲文会中文图书馆目录》(*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Library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著录典籍约 200 余种。1889 年，亨利·霍尔特 (Henry F. Holt) 又在基德所编目录的基础上，参考了大英博物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伦敦大学图书馆所编汉籍目录，以及伟烈

亚力《中国文献提要》、高第《中国书目》等著作，编为《亚洲文会图书馆藏中文典籍目录》(*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经汉学家翟理斯审定出版。该目录共收录典籍 559 种，约 5000 卷<sup>3</sup>。据皇家亚洲文会网站所载，其中文藏书现存利兹大学 (University of Leeds)<sup>4</sup>，故此两种目录所反映者，应为利兹大学目前的汉籍收藏。

#### （七）印度事务部图书馆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成立于 1801 年，以收藏出自敦煌与新疆地区的梵文、藏文、于阗文、吐火罗文等非汉文写本著称，并编有《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等多种目录行世。除此之外，对于一般的汉籍，其也有一定数量的收录，并在 1872 年由汉学家岑马士 (James Summers, 1828—1891) 编为《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中、日、满文典籍解题目录》(*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Japa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India Office*)，著录典籍 170 部。其中尤以佛教典籍最为丰富，此外尚有伴信友著《正卜考》等日本典籍，以及《御制增订清文鉴》等满

- 1 Andrew C. West, *Catalogue of the Morrison Collection of Chinese Books*,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8, XI.
- 2 Andrew C. West, *Catalogue of the Morrison collection of Chinese Books*,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8, XXIII.
- 3 Henry F. Holt, "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Jan., 1890, V.
- 4 The Library and its Collections, <http://www.royalasiaticsociety.org/site/?q=taxonomy/term/3>, 2014-05-22.





文文献。另有少量欧洲印本,如《新约》满文译本即于1821至1836年印于俄国圣彼得堡。

#### (八) 克劳福德图书馆

克劳福德图书馆由26世克劳福德勋爵詹姆斯·林塞(James Lindsay, 1847—1813)建立,为世界上最好的私人图书馆之一。其汉籍收藏于1894年,编为《中文印本及写本目录》(*Bibliotheca Lindesiana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and Manuscripts*),著录各类文献464部,约8000卷。据本书

《前言》所载,书中著录典籍的前248部为1864年购自阿尔斯坦(Pierre Léopold van Alstein, 1792—1862)位于根特(Ghent)的图书馆,其余则购自法国汉学家颇节(Pauthier)之旧藏,以及英、法、德等国的书商,一些急需之书甚至由北京的代理商直接采购。<sup>1</sup>书中著录的大部分均为中文典籍,亦有一部分满文及少量韩文文献。目录编成后不久,该图书馆所收藏的汉籍,即于1901年售于今属曼彻斯特大学的约翰·莱兰兹图书馆(John Rylands

Library),故本目录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约翰·莱兰兹图书馆目前收藏汉籍的情况。

## 二、英国图书馆所编汉籍目录的分类方法

在上文所述的14种英国图书馆编汉籍目录中,有一部分并未采用任何分类法。如艾约瑟编《博德利图书馆中国典籍目录》,仅将所收录的文献简单地编号排列,其排列亦为四部混编,而并无内在逻辑,如自1号至11号,既有《书经》《监本易经》等经部典籍,又有《行远集》《初学小题登龙》等制艺类著作,12、13号分别为史部的《东晋志传》与《圣谕广训》,而14、15号又变为经部的《四书合讲》与《小学体注》。此类目录因缺乏分类,导致文献检索困难,其编纂总体而言较为落后。但除了有限的几种之外,大部分目录都对其著录的文献作了不同形式的分类,其形式主要可分为三种:

第一,关键词首字母法。此法由道格拉斯《大英博物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首先采用,其后该目录的《续编》以及克劳福德图书馆《中文印本及写本目录》也都采用了这一形式。此法的具体方式是:“本目录中的图书按作者名的首字母顺序进行编排;若书名或书中任何位置未出现作者名,图书则按书名中的人名或国家进行编排;若书名中未出现人名或

<sup>1</sup> James Ludovic Lindsay, *Bibliotheca Lindesiana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and Manuscripts*, Wigan: Privately printed, 1895, IX.

国家,图书则按书名主题词或关键字进行编排。”<sup>1</sup>例如,对于《文史通义》,即取著者“章学诚”<sup>2</sup>;对于《浙江乡试硃卷》、《浙江乡试同年齿录》,则取地名“浙江”<sup>3</sup>;而对于《织图》、《增补尺牍达衷》,则分别取关键字“织”和“尺”<sup>4</sup>。对于一些关键词不止一个的著作,编排时还会采取互见的方式。如《困学纪闻》为宋代王应麟著,清代何焯(字屺瞻)笺释,故关键词兼取“何屺瞻”与“王应麟”,并在排列靠前的“何屺瞻”条下注明参见“王应麟”条<sup>5</sup>。由于“即便图书中出现作者名,读者更易记住书名,而非作者名”<sup>6</sup>,且某些著作的关键词较为冷僻,不便检索,故采取此法的目录,大都会另编书名索引附于其后,作为辅助检索的手段。

第二,西方学科分类法。此种方法将收录的汉籍按照西方的学科体系加以区分,较具代表性者,如翟理思编《剑桥大学图书馆威妥玛文库汉、满文书目》分为八类,除了置于全书最后的G类为满、蒙文图书之外,其余七类中,A类为儒、佛、道等家的经典与哲学,B类为历史、传记、法规,C类为地理、游记,D类为诗歌、小说、戏剧,

**此法在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的基础上,又添加丛书一部而成,是目前中文古籍分类法中较为常用的一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均以此法编成。**

E类为字典和参考书,F、X、Y类为综合,Z类为西方科技与宗教。<sup>7</sup>又如基德《亚洲文会中文图书馆目录》,分为语言、历史、统计学与地形学、传记、诗歌、博物学、道德哲学、玄学与科学通论、古玩研究、中国政府出版物、典礼仪式、法学、医学、地图、佛教、西方著作译本、小说、游记、幼儿教育、综合等20余类,可谓极为细致,也代表了欧洲学者从西方学科的角度,对汉籍进行分类的较高水平。

第三,五部分类法。此法在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的基础上,又添加丛书一部而成,是目前中文古籍分类法中较为常用的一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均以此法编成。

英国图书馆所编汉籍目录中,采用此种分类法者共有三种,即《牛津大学中文旧籍书目》第一、二卷与《马礼逊藏书目录》。但在具体的类目设置上,各家又有所不同。如《牛津大学中文旧籍书目》第一卷《巴克豪藏书》的类目即如下:

经部:易类,书类,诗类,礼类(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春秋类,孝经类,乐类,四书类,小学类(训诂、字书、韵书、满蒙藏文),群经总义类(群经、总义)。

史部: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诏令、奏议),传记类(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总志、方志、杂记、外记、地图),职官类(官制、官箴),政书类(通制、仪制、邦计、军政、法令、考工、杂录),目录类(书目、金石),史评类。

子部: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推步、算书),术数类,艺术类(书画、琴谱、篆刻、杂技),谱录类(器物、饮馔、草木禽鱼),杂家类(杂学、杂说、杂纂),类书类,小说家类(杂事、异闻、琐记、合刻),释家类,道家类,汇编类。

1 道格拉斯:《1877年版大英博物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页。

2 道格拉斯:《1877年版大英博物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第17页。

3 道格拉斯:《1877年版大英博物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第19页。

4 道格拉斯:《1877年版大英博物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第20页。

5 道格拉斯:《1877年版大英博物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第77页。

6 道格拉斯:《1877年版大英博物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第5页。

7 Herbert Allen Giles, *Catalogue of the Wad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8, VIII.





集部：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通俗小说类。

丛书部：杂丛类，郡邑类，氏族类，独撰类<sup>1</sup>。

该书目的第二卷《伟烈亚力藏书》，其类目与第一卷大体相同，仅有少量的调整。如子部增加一个二级类目“回教类”，天文算法类增加“合刻”、“附录”两个三级类目，释家类新设“经律论疏”、“总说杂记”两

个三级类目，并于“总说杂记”下又分“杂著”、“音义”、“书目”、“讽诵”四个四级类目<sup>2</sup>。需要说明的是，此分类法并非是因书立类，很多类目都是有目无书，如《巴克豪藏书》经部礼类下的周礼、三礼总义类，即注明“无书”<sup>3</sup>。在该书前的《引用书目》中，列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即是采用五部分类法，《牛津大学中文旧籍书目》很可能在分类方面对其

有所借鉴，但亦并非原封不动地加以照搬。例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经部首列“经注疏合刻类”，收《宋刊巾箱本八经》等<sup>4</sup>，《牛津大学中文旧籍书目》即无此类目，而将此类文献置于群经总义类的“群经”之下。可见其仍结合实际情况作出了一些调整。

在《牛津大学中文旧籍书目》之后，于1998年出版的《马礼逊藏书目

1 David Helliwell, *A Catalogue of the Old Chinese Book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Vol.1, The Backhouse Collection*, P.3—8.

2 David Helliwell, *A Catalogue of the Old Chinese Book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Vol.2, Alexander Wylie's Book*, P.6—8.

3 David Helliwell, *A Catalogue of the Old Chinese Book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Vol.1, The Backhouse Collection*, P.5.

4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东京：人文科学研究协会，1981年，第1页。





录》亦采用了五部分类法。其二级类目的设置如下：

经部：总类，易类，书类，诗类，礼类，乐类，春秋类，四书类，小学类，经义类。

史部：纪传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史表类，史抄类，史评类，传记类，政书类，诏令奏议类，时令类，地理类，金石类，目录类。

子部：总类，儒家类，道家类，兵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小说家类，类书类，佛教类，道教类，基督教类，伊斯兰教类。

集部：别集类，总集类，尺牍类，词类，曲类，小说类，诗文评类。

丛部：汇编类，自著类<sup>1</sup>。

与《牛津大学中文旧籍书目》相比，《马礼逊藏书目录》的二级类目可谓更为合理。例如，对于收录二十四史及其相关文献之类目，《牛津大学中文旧籍书目》沿袭《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仍称为“正史类”，而《马礼逊藏书目录》则改称“纪传类”。又如，《牛津大学中文旧籍书目》史部设有“别史类”、“载记类”，收录《大金国志》、《十六国春秋》一类的典籍，而《马礼逊藏书目录》则将其取消，而将相应的典籍收入“杂史类”中，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处理方式相一致。此外，其还根据馆藏的实际情况新设了一些类目，如子部下的“基督教类”、“伊斯兰教类”等即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在二级类目之下不仅普遍设置三级类目，并且还进一步广设四级类目，如经部小学类下设训诂、字书、韵书、字体等六个三级类目，字体下又设诸体、古文、篆书、隶书、草书、异体俗体六个四级类目。其类目之细致，不仅在海外汉籍目录中表现得较为突出，即使在国内所编古籍目录中亦不多见。

### 三、英国图书馆所编汉籍目录的成就与不足

#### （一）成就

从19世纪前期至今的近200年时间里，英国学者先后为8所图书馆编纂的14部汉籍目录，在汉学史、图

1 Andrew C. West, *Catalogue of the Morrison Collection of Chinese Books*, XXXX—XXXIX.

书馆学史、汉籍流传史等方面，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第一，揭示了英国各典藏机构现存汉籍的总体面貌。以上所述 14 部汉籍目录中，如《马礼逊藏书目录》、《惠康医学史研究所图书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目录》等，均为当代所编，著录完备，能够准确揭示其馆藏汉籍的情况。另有一部分目录，如《剑桥大学图书馆威妥玛文库汉、满文书目》等，虽然因编纂较早，而导致著录多有简略不确之处，但鉴于这些图书馆百余年来并未新编汉籍目录，故仍不失为了解其馆藏汉籍的主要渠道。此外还有一些目录，如克劳福德图书馆《中文印本及写本目录》，其所著录的汉籍虽然现已易主，并可能在此过程中有所变动，但其主体部分应不至有大的差异，所编目录仍可作为了解当前机构所藏汉籍的重要参考。通过对这些目录的查阅，可以获得相应典藏机构收藏汉籍的数量、种类、版本等多种信息的认识，在揭示馆藏汉籍总体面貌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 从 19 世纪前期至今的近 200 年时间里，英国学者先后为 8 所图书馆编纂的 14 部汉籍目录，在汉学史、图书馆学史、汉籍流传史等方面，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第二，著录了多种流入英国的珍本善本。例如，《大英博物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续编》中，著录有刘仁初《三场文选》八卷、《文选对策》八卷，均为朝鲜刻本，前者刻于明景泰五年（1454），后者刻于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此本在国内未见流传，国外目前所知，仅日本内阁文库藏有一部，黄仁生《日本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著录，<sup>1</sup>又国会图书馆与蓬左文库亦有收藏，但皆为残本。故此处所著录的藏本可谓颇为珍贵。又如《剑桥大学图书馆威妥玛文库汉、满文书目》著录有《叶文庄公奏议》

一部<sup>2</sup>，应为明崇祯间刻本，《中国古籍总目》仅著录国图与上图有藏，<sup>3</sup>亦可谓较为稀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据剑桥大学图书馆网站，此本尚钤有“燕庭藏书”、“刘喜海印”等多枚藏印，<sup>4</sup>可知当为清末著名藏书家刘喜海旧藏，更加值得重视。此类珍善之本，在上述 14 种目录中屡见不鲜，应加以重视并进行深入探讨。

第三，描绘了汉籍的流转历史。例如，《大英博物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续编》著录《永乐大典》卷一九七八九至一九七九〇一册，<sup>5</sup>据《前言》可知为翟理斯于 1903 年左右赠送给大英博物馆。<sup>6</sup>《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中、日、满文典籍解题目录》著录佛典 70 余部，据《前言》可知是由英国东方学家威尔逊（H.H. Wilson, 1786—1860）自中国搜集而来。<sup>7</sup>《惠康医学史研究所图书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目录》在著录典籍时，凡来源可考者均予注明，如《伤寒论条辨》来自于以研究中国伊斯兰教著称的英国传教士安献令（George Findlay Andrew, 1887—1971），<sup>8</sup>而《疮疡经验全书》

1 黄仁生：《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长沙：岳麓书社，2004 年，第 53—57 页。

2 Herbert Allen Giles, *Catalogue of the Wad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66.

3 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古籍总目·史部》，北京：中华书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3575—3576 页。

4 Wade Collection Seals of Ownership, <http://www.lib.cam.ac.uk/mulu/seals.html>, 2014-5-22.

5 Robert Kennaway Douglas, *Supplementary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and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 P.176.

6 Robert Kennaway Douglas, *Supplementary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and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 I.

7 James Summers,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Japa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India Office*, London: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in Council, 1872, III.

8 Walravens Hartmut,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and Manuscrip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London: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1994, P.8.

则为我国近代医学家伍连德旧藏。<sup>1</sup> 这些著录对于探寻汉籍流入英国和在英国流转的轨迹,及由此反映出的中英文化交流的历史,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四,展现了英国编纂汉籍目录的历程与成就。通过上文叙述,可以看出,英国对汉籍目录的编纂,从时间上而言,主要集中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两个阶段;从编排方式上而言,经历了由无分类、以关键字首字母分类、西方学科分类,到五部分类法的过渡;从著录上而言,则实现了由早期的体例不一、简略舛误,到后期的体例明晰、详尽准确。其历程可谓是英国汉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本文所举的多种汉籍目录,均为英国著名汉学家,如翟理思、道格拉斯等人所编,这些目录对于探讨汉学家个人的汉籍研究成就,也具有重要价值。

## (二) 不足

第一,分类法与文献归类方面的不足。早期的汉籍目录,由于没有采取适合汉籍自身特点的中国传统分类法,导致其在编排的过程中出现很多

### 早期的汉籍目录,由于没有采取适合汉籍自身特点的中国传统分类法,导致其在编排的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

问题。如以《大英博物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为代表的一派采用关键词首字母法,但其所取关键词标准并不十分统一,特别是对于一些没有作者、地名的文献,在选取关键词时就显得较为随意。而对于一些责任者不止一人的典籍,则又不得不重复著录,有的达三四次之多。《亚洲文会中文图书馆目录》代表了采用西方学科分类法的另一派,但在类目设置上,也因学科体系的不同和对汉籍认识的不足而出现失误,如其设“三教”一类,收录了《搜神记》、《三教搜神》、《封神演义》三书,<sup>2</sup>就不很妥当。而近年所编的汉籍目录,虽然普遍采用了五部分类法,但在文献的具体归类

上,也有不准确之处。如对于《马礼逊藏书目录》,有学者即指出,其将《明心宝鉴》收于子部道家类不妥,通行的做法是收于子部儒家类或杂家类,<sup>3</sup>可见其在归类上仍有可改进之处。

第二,著录方面的不足。例如,《大英博物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于每部典籍之后均注明年代,但其所著录的年代,有些是经考证得出的刊刻年代,有些则只是根据书前序言等而得出的成书年代,二者混杂一处,很容易对使用者造成误导。有学者正是由于不明此点,而认为此书著录的“宋、元版的有7部,明版书籍有109部,而清代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的刻本,居然高达1100部之多。7部宋元版古籍中,北宋的《春秋详解》和《资治通鉴》,南宋的《礼经会元》、《大戴礼记》和《书经详解》这五种书,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国内其他公立机构均无收藏”。<sup>4</sup>实际上,其所收录的《春秋详解》为明末吴韩起编,<sup>5</sup>《资治通鉴》为胡三省注本,<sup>6</sup>均无缘得至北宋;《礼经会元》为清代陆陇其点定本,<sup>7</sup>《大戴礼记》为明末沈泰阅,<sup>8</sup>《书经详解》亦为吴韩起

1 Walravens Hartmut,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and Manuscrip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P.15.

2 Rev. S. Kidd,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Library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London: John W. Parker, 1838, P.48.

3 T. H. Barrett, *Catalogue of the Morrison Collection of Chinese Books by Andrew C. West*;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and Manuscrip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by Hartmut Walravens (Review)”,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62, No. 2, 1999, P.393.

4 余义林:《“汉籍之路”上的行者》,载《光明日报》2013年9月13日。

5 道格拉斯:《1877年版大英博物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5页。

6 道格拉斯:《1877年版大英博物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1页。

7 道格拉斯:《1877年版大英博物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第147页。

8 道格拉斯:《1877年版大英博物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第31页。





编，<sup>1</sup>也不得定为南宋刻。这一误解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于其年代著录之不规范造成的，如对于《资治通鉴》，其著录为1067年，亦即北宋治平四年，这实际是卷前《御制资治通鉴序》所题的年代，并非刊刻时间。此类著录的不足，在早期汉籍目录中大量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目录的利用价值。

第三，版本考辨方面的不足。例如，翟理思在《剑桥大学图书馆

威妥玛文库汉、满文书目续编》中著录《杜工部诗集》一种，并据卷前蔡梦弼序，定其年代为1204年，即南宋嘉泰四年。<sup>2</sup>此本今虽未能寓目，但据剑桥大学图书馆网站著录其作“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二十卷文集二卷”，<sup>3</sup>可知应从元初高楚芳所编二十卷本《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集》出，其成书即在元代，不应有南宋刻本。且此书明代翻刻极多，书贾多有将刻者刊落以充宋刻者，如《天

禄琳琅书目》即著录一本，谓：“后一部标题次行称‘玉几山人校刊’，此本无之，所空一行亦未别刊姓氏，则知玉几山人者必为明人，书贾欲伪作宋槧，嫌其名而掩之，固瞭然也。”剑桥大学藏本疑即此类。翟理思为英国著名汉学家，亦不免有此误。英国所编汉籍目录在版本考辨方面的薄弱，由此可见一斑。

1 道格拉斯：《1877年版大英博物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第245页。

2 Herbert Allen Giles, *Supplementary Catalogue of the Wad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3.

3 Withdrawn Chinese Books Shelf List, <http://www.lib.cam.ac.uk/mulu/fbw.html#FB.563>, 2014-5-22.

## 荷兰国际亚洲研究所



荷兰国际亚洲研究所，英文全称为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简称 IIAS，是世界知名学术研究机构之一，是由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学院、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和莱顿大学于 1993 年共同建立的一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该所现任所长 Philippe M.F. Peycam。

荷兰国际亚洲研究所主要开展有关亚洲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范围包括语言学、

人类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领域。国际亚洲研究所的主要目的是鼓励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亚洲研究，主要围绕“亚洲城市”、“亚洲”和“亚洲遗产”等三大主题，鼓励通过学术对话促进国家和国际合作，推动亚洲研究信息的收集和传播活动的发展。

荷兰国际亚洲研究所作为一个知识和信息的交流站，在联系不同国家合作者中发挥了灵活的协调作用。其活动包括提供信息服务、建

立国际网络、提出国际合作项目和研究计划，以及为荷兰和国外学者提供在该所（或荷兰国内外类似机构）内进行合作研究的机会等。

国际亚洲研究所经常组织学术研讨会、专题讨论会和大型会议，出版简报，并建立了欧洲与世界范围的亚洲研究学者和当前研究信息的数据库。1998 年出版了《欧洲的亚洲研究指南》（该数据库的印刷版本）。

#### 荷兰国际亚洲研究所

Visiting address: Rapenburg 59

2311 GJ Leiden

the Netherlands

Postal address: P.O. Box 9500

2300 RA Leiden

The Netherlands

Tel: +31-71-5272227

Fax: +31-71-5274162

Email: [EIIAS@iias.nl](mailto:EIIAS@iias.nl)

<http://www.iias.nl/>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主编 郭棲庆 赵宗锋

编辑 王惠英

设计 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mailto:icwar@bfsu.edu.cn)

电话: 86-10-88813845

传真: 86-10-88816556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综合教学楼 1041 室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